

# 多少歡笑如夢

吳崇蘭

## ——記我們的長官

其實，說「我們的長官」，應當是「外子的長官」，只是因為在外交部工作的外交人員，一切活動都帶着太太，先生的長官，也就成了太太的長官了。所以，我說「我們的長官」，是不必訝異的。

外子周谷兄自一九五七年高考取外交官，一九五九年進入外交部至一九六九年辭職，在外交界工作計十年。十年不算短，但在外交工作的本身來說，十年也不過剛剛入門。其辭職的原因，和辭職後所遭受的種種打擊，將來我會另章寫出，而在他工作時的直屬長官對我們的關懷、欣賞，其知遇之情，使我們終生難忘。

### 簡氏夫婦印象鮮明

剛進外交部，外子是在禮賓司第三科工作。當時第三科科长是禮賓司幫辦簡文思兼任，他是一位循規蹈矩、彬彬儒雅的人。他的夫人張維玲女士，稱得上是個美人，穿什麼衣裳都好看，能說會道，是位標準的外交官夫人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她穿一件淺古銅色的錦緞旗袍，上面綴滿小小的紅綠宮燈，我覺得好看極了。她說這是老衣裳了

，因為好久沒有穿它，就拿出來穿穿，我後來在店鋪看到有相近花式的錦緞，買來做了一件旗袍，穿在身上，自覺俗不可言，土得要命，才深切的體會到東施效顰的這句古語的深意。簡氏夫婦與外子都是四川人，因係同鄉，長官下屬之間，特別和諧。只是簡先生不久就外調至我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任參事。幾度遷升，一直到他退休，迄今已二十多年，再沒有見過面。不過每年都有賀年卡來往，從賀年卡上密密的字跡，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近況。算起來，簡氏夫婦該已登古稀之年，我們難得那麼遠，但他們的健康情形、生活狀況，以及含飴弄孫的行樂圖，在我們的腦海中有似常常見面的老朋友那麼鮮明。長官下屬之間的情誼，能够維繫到這般地步，也是很難得的了。

### 忠厚長者歐陽先生

簡先生外調後，繼任護照科科长便是歐陽中庸。歐陽先生和他的夫人羅黛西女士都是湖南人。歐陽先生老成持重，亦是一位忠厚長者，他平時說話不多，倒是他的夫人，性格豪邁，說話爽快

，他們兩人，一個讓人感到平易近人，一個讓人覺得異常熱絡。後來歐陽先生調任我駐越南大使館的公使時，外子已經外調到我駐美大使館工作。他們倆夫婦為了一兒一女的學業，曾將他們寄居在我們家，在美國上學。姐姐瑪麗像母親，弟弟大衛像爸爸，一個外向，一個內向；但內向也好，外向也好，兩個人的讀書成績都不錯。那時候，越南受越共的擾亂，炸彈槍砲，一日數驚，辦公人員都提心吊胆。歐陽夫婦職責所在，以身許國，幾乎把萬一發生意外的後事都交代清楚了，其忠公為國丹心可見。歐陽先生在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當公使調回國內時，夫婦倆曾在經過美國時來看過我們，那時歐陽先生已經準備要退休了。他告訴我們，他退休以後，準備找一個幫助教授找資料的工作，一方面自己埋頭寫作。歐陽先生以打太極拳健身已有數十年歷史，有一次在他家裏吃飯，他還表演給大家看，真是有板有眼；即是他到了退休之齡，仍是腰挺、背直、步健；誰想退休未幾，即因心臟病逝世。噩耗傳來，大家都感到意外，而他的壯志未酬身已死，大家都為他嘆息不已。

## 鴻才參事英年早逝

外子在駐美大使館工作，歷時六年，身經兩位長官。

在我駐美大使館，外子分在政治組工作。

九六三年，美國正是甘迺迪總統鋒頭的時候，而我駐美大使館的氣派也非凡。辦公樓中，電梯上下，工作人員幾近百人。大使館邸「雙樂園」，林深地廣，約可容納五千賓客，為華府勝景之一。在經過使館區時，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，在中國大使館門口飄揚，映着天光日色，紅的分外紅，白的分外白，藍的亦分外藍；每個中國人看到這面國旗，心榮氣壯。而使館的工作人員，那時的薪水在東南亞及非洲一帶，可以請幾個傭人，在美國算起來，是屬於平民階層，好在外國人習慣打聽人家的經濟情況，即使偶爾有相熟的外國使館人員提起，我們不是虛張聲勢，便是唯唯否否含糊過去。記得有一個非洲國家駐美使館的秘書，與外子是同樣的職位，因為晚間都在美國農業部上課，有了同學這層關係，彼此握手拍肩膀非常親熱，公事上有所來往，也得到很多方便，有一次他提起他的薪金，竟是外子的一倍。外子當然也以「差不多」三字含混過去。雖是如此，使館的工作人員，個個深具信心，鬥志甚濃。當時負責政治組的參事，是鄭建生先生。鄭先生原籍廣東，生長在北平，父親鄭國材，英年早逝，鄭建生的弟弟即為遺腹子。太夫人獨自撫孤，倍極辛苦，鄭先生事母至孝，他的夫人孫瑞芳女士，與他本是國立政治大學同學，兩人因喜愛音

樂，課餘參加歌詠團而相識，相愛甚深。

鄭先生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，人長得很清秀，剛正不阿，幹勁十足。當時正是蔣廷黻先生任我駐美大使，蔣先生為書生名士，但已是體衰氣弱，夕陽晚景。凡事多半是鄭先生挺頭陣，打先鋒，鄭先生對下屬亦很親切和氣。有兩件小事，可以看出他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：

當年使館裏的工作人員，除了一、兩位能分期付款買了房子，算是有自己的居處外，其餘的多是賃屋而居。鄭先生的居處，有四、五家使館工作人員聚居在一起，每日上下班來回兩趟就得一個多小時，汽油的花費、汽車的耗損，甚不經濟。鄭先生即提議同車輪開，如此共一車上下班，每家輪流一禮拜，隔一個多月才輪到一次，既省了汽油汽車，又節省了人力。這個議案開始行動後，固然有許多不方便，却一直維持着，沒有一家有關話，等到鄭先生調到駐加拿大大使館任公使後還維持了一段時候，後來因為工作人員不斷的調職遷離，才無形中解散。

又有一次週末我大使館舉辦郊遊，同仁一起到華府附近的海洋城名勝遊樂。在一輛大巴士上，起初都是就近坐在一起的，大人的唧唧噥噥，孩子的吵吵鬧鬧充滿車廂；鄭先生覺得沒有生氣，郊遊趣味不濃，就站到車頭，當場急就章教會大家一支兒歌：

張家的娃娃有點兒傷風又咳嗽，張家的娃娃有點兒傷風又咳嗽，張家的娃娃有點兒傷風又咳嗽，給他擦點兒

萬金——油！

大家一遍一遍唱得興高采烈之後，就引來一支一支的老歌、英文歌、抗戰歌曲全出了籠，滿江紅也聲入雲霄。車子過處，歌聲飛揚，大人孩子一起充滿歡樂，車子的行程變得十分輕靈，這一次的郊遊，成為使館裏空前絕後的一首令人回味無窮的大家樂。

鄭建生先生調任我駐加拿大大使館公使後，因公來華府，還特地與他夫人一起來我們家探訪我們，我們對鄭先生的忠誠、學識、能力、衝勁，以及處世為人，深深覺得有朝一日他能擔任獨當一面之職，當更能施展他的抱負，他的鴻才。一九七三年他擔任駐史瓦濟蘭國大使，消息傳來，使館同仁無不為他高興，而我們一家，尤為他慶幸。因為這雖然只是個小國家，至少鄭先生終於是獨當一面了。他還在少壯時期，未來的前途當可隨着他獨當一面的業績遞升，為國服務的機會正多。誰知他到職未及數月，即因車禍喪生。聽說那天他是去參加一個僑團的宴會，即席演講，深獲僑胞愛戴，這是他到任三個月內的收穫之一。豈知歸途中出了車禍，他不但不能再為國服務，也已回不了家，與他家人團聚。

鄭先生的夫人悲痛欲絕，他的小女兒因為這場突變，受不了刺激，竟至神經失常，全家都陷於失措傷慟中。

鄭夫人孫瑞芳女士愛好音樂，文筆亦很不錯。我一直鼓勵她寫作投稿，她寫了幾篇在「創作」雜誌刊出，以後因為生活繁忙，再沒有執筆。鄭先生去世後，她到紐約我領事館工作，撫育遺孤，自己作曲寫詞，作了一首懷念鄭先生的歌。

有次她來華府，唱給我們聽，聲淚俱下，我們也覺得萬分淒然。這首歌我至今還珍藏着，現在我把歌詞抄錄如下：

窗外月殘，星移夢景，淒迷依稀。  
情怯意寒，倦眼難啓，畏對另一個晨曦。

是驚濤？是細雨？是烏雲？是清溪？  
往日的歡樂安怡，隨你已驟逝無迹，  
無迹，無迹，空有那，空有那淒迷孤  
寂，孤寂淒迷，伴我長相憶。  
星月再現，簾幕垂掛，是輕喜，是深  
念？

多一個黃昏，引我與你重相見。  
微雲一片，繁星萬千，  
朝朝暮暮，春來春去，  
思君念君又一年，  
思君念君又一年！

當鄭先生驟然謝世之時，我們一家也正陷在莫可奈何的低潮中。

那時外子辭職之後，家無積蓄，一家五口，除了最小的女兒，大家合力打工謀生。就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一家雜誌登了一小段隱名影射，似是實非的小文，指外子之進入外交部工作，全係某公所介紹，而我則是個無能之輩。某公想係指的岳公張先生。岳軍先生為外子父執，外子是以外交官高考及格資格，由外交部逕予派任才進入外交部工作，以後才多次晉見岳公。而我自己，我

承認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，但我做事認真、努力、負責。在國內教書十年，兩次獲得優良教師之獎。自民國三十年開始寫作，雖然寫得容或不够好，但在那麼多年的貧窮掙扎裏，仍能寫作不輟，勇氣亦堪嘉。外子辭職後，我立即去學打卡維生，經理對我的勤勞嘉獎有加，無能之輩，能如此刻苦自勵，我想亦是值得尊敬的。不久又接到某編輯私人來信，云我已被列入黑名單。……凡此種種打擊，我們都明白是來自數年來蓄意造成外子辭職者之手。我當時悲憤莫名，哭了三天三夜，在台北聯合報上寫了一篇「中國人的光輝」以洩心中悲憤。

### 中國人的光輝

(一)

你說，你失落了。  
是因為失落了，才長久的緘默嗎？還是因為長久的緘默，才失落了？  
你說你不知道。

好吧！你知道也好，不知道也好，我相信，從戰火與苦難中過來的你，決不會長久的失落，也決不可能因失落而倒下去。

我知道你只是在緘默中冷眼觀看人間，細品苦澀中的溫情。

對於那該開着而關閉的門，以及許多莫須有的流言責罵，我知道你心靈的創痛是無限的。但你未曾申訴，也未曾懷恨。

你說過，你心中充滿感謝。為那些友善的微笑，關切的話語，支援的手。那些像朵朵鮮花，開遍你的心頭。

你說過，你感謝那些涓涓長流，不斷的友情，甚至於感謝那些煎烤你的火，打擊你的錘。因為沒有火，沒有錘，鐵不會變成堅強的鋼。

但我知道，你哭過，你傷心的哭過；為忠厚之人，獲得毀謗；為人們以彎曲之心，來看是非；為世間的黑白不能分辨。……

那些日子，你翻閱史記中的屈原傳，一遍，兩遍，無數遍。你哭，為屈原，也為自己。

你驚奇於世人的虛偽、險惡。因為你一向誠懇，一向純潔。你一直相信，相信人們面對面的臉面。直到你發現那背後的另一張，你好失望，好傷心，好痛苦！

但是，別這樣，你看到麼？你並不孤單。

一個真誠的朋友，就可以抵消所有你忍受的一切。而你，不止一個。你該笑，你該快樂，是不？

我知道你不信基督耶穌，也不信神。但我相信，神就在你的心中。你會重新獲得希望、信心，與快樂。

(二)

你覺不覺得？中國人的光輝，不單單是得諾貝爾獎金的楊振寧、李振道，或者政治家顧維鈞、亞洲鐵人楊傳廣、女鐵人紀政、銀行家吳隸棠……以及許許多多名聞遐邇的大人物。

那些分佈在各國各地各個角落，終日孜孜不倦，確守本分，辛勤工作，得人賞識的，平平凡凡的，中國的小人物，他們點點滴滴的血汗功勞，一樣不可磨滅。

前者是高，高只是一種稀少的特殊；後者是

廣，廣卻是大量的普通。普通所造成的影響力量，有時比特殊更大，究竟特殊只是少數。就是這特殊的少數，也必須從低、從矮、從小，慢慢一步步升高的。你能說這些腳踏實地，埋首努力的人，不值一寫嗎？你能說他們只是有一些以有限薪水做低級工作的人員，而忽視他們，輕看他們嗎？我們佩服那些在異鄉異地能掙扎得出人頭地，為中國人增光的出類拔萃的人才，但也並不輕視那一般在異國異鄉紮根生基，為中國人在海外建立信譽的廣大的一羣。

舉個實例吧：我認識一位太太，她在華盛頓一個打卡公司工作有年，這個公司是專門收集各家公司需要打卡的資料，來為各家公司服務的。一家公司的資料有一家公司形式，各家公司的資料都不同，甚至同一家公司的資料，也有各種不同的形式。要在腦子裏清清楚楚有條不紊的記住那些不同的格式，還要打得快，打得正確，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她卻能夠在那個公司愉快勝任，不但能愉快勝任，更能為主管所激賞，被主管所重視，做到舉足輕重的地步。那公司的老板倚仗著她，唯恐她會辭職他去。而她，不但能獨善其身，更能兼善他人。經她援引進去的中國人，前後後也有不少。在裏邊工作的每一個中國人，也都以勤勉自勵，至今這個公司的老板，對於中國人非常欣賞。有中國人去申請工作，多半准的成分多。造成一種好印象的她，以及在裏邊工作的許多中國人，你能說她們做得不够好嗎？你能說她們不值得喝采嗎？

中國人很誠懇！

中國人很勤勉！  
中國人很聰明！  
中國人很少犯法犯罪的！  
中國人是非常信實的！

這許許多多的好評，好印象，不都是這些腳踏實地的平凡小人物所做成的嗎？

一九六九年十月於華府

在那樣自問自答，自說自話，自我安慰的哭泣低潮時期，得知鄭先生的遽逝，我有一種三國演義上廖立、李嚴獲知諸葛亮去世時的感覺。

我的感覺和廖立、李嚴的感覺相比擬，是有些不倫不類的。廖立自謂才名宜為孔明之副，嘗以職位閑散，快快不平，怨謗無已，於是孔明廢之為庶人。徙之汝山，及聞孔明亡，乃垂淚曰：「吾終為左衽矣！」李嚴則因軍糧不濟，懼恐責罰，妄言貽誤軍情，謫為庶人，聞孔明死，亦大哭病死。蓋李嚴嘗望孔明復收己，得自補前過，度孔明死後，不能用之故也。

廖立與李嚴，皆因自己過失，被孔明所責罰。而由孔明之死，觀他們由衷的悲嘆，可知孔明是一個如何得人心的好主管。鄭建生先生之於我們，也像孔明一樣不但是個好主管，亦是一知己。世上的知己難得，能不悲痛乎？

## 陳衡力幽默又風趣

鄭先生調去加拿大後，接掌政治組的是參事陳衡力先生，後來升任為公使。陳先生亦是說一口

道地的京片子，他是一個幽默風趣的人，公事上，秉承上意，絕不馬虎。他的手、腳、行動不很靈活，好多人說，他年輕時，人長得帥，又活動，又會說話，一定是太風流了，留下的風流債。其實是在抗戰時吃了很多苦，還受過牢獄之災，這都是那些災難的後遺症。只是他不願提那些往事罷了。這常常使我想世上有多少人，頂著被誤解的名，眼淚在心底流的痛苦。

外子辭職後，大約有二、三年的樣子，陳先生即因體力衰退，告老退休。他退休後，雖然手脚不十分方便，仍致力於教學工作。他一方面在華府的美國大學進修博士學位，一方面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教職。

陳先生得到那個博士學位，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。讀書，他是很有功的，他一直孜孜不倦的研究、學習。有人對他說：你這麼大年紀了，行動又不方便，何必還要去讀博士學位呢？他可不這麼想，退休了，他並不想做廢物。在學校裏，他的指導教授對他也很欣賞。最後一年，論文已經做好，只等口試通過這道手續了，他的指導教授突然因病去世。這一來，他那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就成了問題；學校裏，誰也無權頒發這個學位給他，而他又確實實應得到這個學位的。後來學校為他想了個變通辦法，幫他轉學到就近一個規模小的大學去，與該大學的教授商量，把論文繳到那兒，由那個大學頒發給他博士學位。陳先生得到博士學位後，就到喬治城大學教中共問題。

由於陳先生教授中共問題，陳先生與外子由

僚關係更成了共同切磋中共問題的朋友。原來外子自一九六三年來美國，即從事中共問題的研究。不但每個週末風雨無阻的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找資料，自己也購買、閱讀不知多少有關中共的書籍。房子裏一房間頂天立地的書架上，全是他的書，他也寫了不少有關中共問題的文章，那些文章刊出後，常常有僑報轉載。另有厚達四百餘頁的「中共篡奪權鬥爭」專集。華府的朋友送了他一個樂銜——中共問題專家，一旦有關這類問題，就會打電話來請他分析。陳先生對外子的研究精神和他的成績，十分欣賞，有一次，美國大學的一位教授要想找一位助手，幫助他做研究工作，陳先生立刻介紹外子去見那教授，他認為外子是最適合那個工作了。而我也認為外子在這方面是有他的特長的：歸納、演繹、分析、推測，都是有條有理，清清楚楚，記憶力也特佳。只是這位教授因為外子沒有正式較高學位，薪水報銷有問題而作罷。事情雖然未曾成功，那知遇之情，我們深藏心中，感激無已。

陳先生退休後，一方面教書，教課之暇，每個月定期和朋友聚一次，打打小麻將以自娛。他愛好平劇，他嗓音宏亮，口齒清晰，塊頭又大，是花臉和小丑的好角色。華府有國劇演出，他也常常粉墨登場。他一出場，鼓掌之聲即不絕於耳，不是捧場，是真正的喝采。

陳先生夫人李英芷女士是韓國華僑，黛眉杏眼，婉轉嬌俏，她一直在美國國務院設立的語文學校教中文，那些學生，都是不久要派到亞洲的駐外人員，對她都很尊敬，她可說做了不少國民

外交的工作。回到家裏，她又是一個好主婦，家事一把抓，做得又快又好，她的燒餅、油條、春捲，以及酥餅、小點心，到他們家吃過的人無不嘖嘖稱道。而由於陳先生手脚不便，她在家裏，擔任主婦之外，又是護士的角色，在陳先生粉墨登場時，她又擔任跟班角色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去歲（一九八三）陳先生因車禍進醫院時，正值暑假，有兩週假期，因為他需要休養治療，他又請假兩個月，立即向喬治城大學他的系主任推荐外子以自代。只是當系主任打電話來找外子時，外子正好不在家，而我們又不知道系主任的姓名、住址及電話號碼，不能和系主任連絡。陳先生依照學校規定，又不能把系主任的姓名、住址及電話號碼私自給我們。如此因循拖了一星期，事情延宕不決，而陳先生又有了併發症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，他自知不起，就不管三、七、二十一，將系主任的姓名，及電話號碼告訴外子，要外子親自去找他。陳先生最後打給外子的電話是我接的，因為外子正去圖書館用功去了。陳先生說：「叫周谷直接去找系主任，帶着他的著作，他是這方面的專家，相信他們會欣賞他的。我已無能為力。——不用打電話給我，我沒有力氣講話。」他說這些話，聲音低沉無力，而且斷斷續續，不能一口氣說完一句話，我在電話這一頭，可以想像到他憔悴衰弱的樣子，我一向是一個不願將朋友的好意，在口頭表示感謝的人。但是，這一刻，我有一種預感，覺得如果我不把我們的感謝說出來，也許永遠沒有機會了。所以我當時對陳先生說：「

我知道，這一件事情也許不會成功。但不管成功不成功，我們是非常非常感謝的。在我們的生命史上，我們都會帶上感謝的一筆。」

外子去拜訪系主任前，到醫院去看陳先生，陳先生又支撐着自己，在推荐書上又加了幾條好的評語，鄭重的簽了名。經過一些手續，外子終於見到了那位系主任。他看了外子的著作，很為驚奇，也十分讚賞。不過他說：現在又有兩位有博士學位的人在申請，但只要可能，我們會儘量將你優先考慮。

自然，這種優先考慮若是成爲事實，這將是破天荒的革命，非常的突破。可惜這個世界上能夠獲得突破的幸運者並不多；而我們也都是能够甘於平凡，甘於貧窮的人。得既不喜，失亦不會喪志。外子的脾氣倔，有時沉默得令人生厭，有時又大放厥詞，自他辭職後更是不羈，古人說：貧賤可以驕人。或者貧賤於他更相宜，因為不論他做什麼，不會有太多的責難，即使有所責難，他也可以不在乎。不過，陳先生兩次對他的竭誠推荐，我們永記心頭。

陳先生去世，我們沒有去追悼吊唁，只請朋友支玉珍帶去奠儀及慰陳夫人小詩一首：

記憶種種，  
多少歡笑如夢。

人間天上隔幾重，  
但請切莫過分哀慟，  
好讓逝去的安心長眠地下。

一九八四年四月廿日於瑪利蘭